

第四章 民初教育學與教育史學門的學術追求

民國肇建，袁世凱與段祺瑞先後執政，造成軍閥割據與政黨勢力持續對抗，外交方面，與英俄各國交涉善後活動亦未獲得一致支持。¹

在教育方面，自晚清創立師範學堂以來，至民國成立，中國政體逐步轉型，成爲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在此轉變中，爲適應政體的轉變，教育宗旨也隨之改變，以適應國家的教育需求。因此，中央與各省教育組織也有所興革，其中，中國新任教育官員及晚清所設立的各省教育學會，於民國初期共同在有限的教育經費下，維持中央與地方教育。在師範教育機構方面，民初高等、師範學校，亦調整教育目標。在留學政策方面，由於晚清推行新政，部分知識份子前往歐、日留學，美國歸還庚子賠款中陸續遣人赴美，使民初中國社會漸形成了一批接受西方文化薰陶，而又認識傳統舊學的社會菁英。

以下第一節將以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爲例，討論蔡氏對師範教育及教育學抱持的立場，再由氏所擬師範教育相關政策及法令，分析民初教育學性質。再進一步討論教育學界內部開始提倡教育學術與研究環境的歷程。第二、三節則分別以教育學與教育史兩學門爲中心，藉由其研究與相關論述，討論教育學內部議題發展情形。

第一節 官方教育政策與教育會的學術傳播

民國成立，留學歐、日學者在中央與地方教育行政機關，或民間機構組織中凝聚力量，推行教育相關活動但各有勢力。當時對於教育學發展，民初時期，中央所欲推行的教育政策，及教育方針中有哲學理論成份。至於地方，民初國內並無物質條件提供研究教育學更好的學術環境，雖有學者積極號召，要發展教育學研究，但在環境與教育制度等因素的限制下，教育學類期刊仍留在仕紳辦理的教育刊物，提供交流與對話的平台，而未能進一步與師範學校或其他教育相關研究機關結合。因此，官方的教育政策、學界學術研究意識的抬頭、教育會與學術刊

¹ 參見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修訂版），（臺北：聯經，2001），頁 60，79

物的學術交流等，成為影響民初教育學發展的外部因素，以下分項討論。

一、民初教育總長的教育政策與學界反應—以蔡元培為例

影響民初教育發展的重要人物之一是蔡元培，因此以下將專門討論其所主張的教育政策與學界反應。

民國肇建，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於南京，任命蔡元培先生擔任民國首任教育部長。蔡元培能入閣，與其長期參與同盟會等革命組織，並且致力於新教育工作有關。

蔡元培（1867-1940），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人，²年二十三，中舉人，³三年後中進士，經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⁴後任翰林院編修。光緒二十四年（1898）因維新失敗，棄官出都，嗣任紹興中西學堂，開始從事新式教育。⁵庚子以後，與葉瀚、蔣智由、黃宗仰等人籌組中國教育會，用文字鼓吹革命。⁶翌年（1903），俄國背約終止東三省撤兵，蔡元培發起拒俄義勇隊，並成立軍國民教育會，⁷屬於秘謀武裝革命組織。光緒三十一年（1905），中國同盟會正式成立，蔡元培被推舉為上海分會會長兼主盟人，⁸為翰林參加革命之第一人⁹。

於此期間，蔡元培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開始研究學校課程及學級編制，他將日本各種學校課程，按大學校、高等學校、大學預科、高等師範學校、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等學科詳加抄列分析。¹⁰次年（1901），蔡氏撰寫《學堂教科論》，其中除抨擊清代科舉之弊，並依據日人井上甫水之說，將學術分為「有形理學」、「無形理學」（亦謂之有象哲學）及「哲學」（亦謂無象哲學，又曰實體哲學）三種；¹¹輔以韓非子「理」、「道」之分，將井上的學術架構釋為：「無形理學為有形理學之統部，統部即盡稽萬理之義。彼云哲學，即吾國所謂道學也」。¹²

² 參見孫常緯編著，《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上），（台北：國史館，1985），頁1。

³ 同前引書，頁33。

⁴ 同前引書，頁53。

⁵ 同前引書，頁97。

⁶ 同前引書，頁199。

⁷ 同前引書，頁213。

⁸ 同前引書，頁228。

⁹ 同前引書。

¹⁰ 同前引書，頁121。

¹¹ 參見孫常緯編，《蔡元培先生全集》（續編），（台北：臺灣商務，1991），頁107。

¹² 同前引書，頁107。

在上述架構下，蔡元培取中國各家學術，置於各架構之下臚列學目。其中，「無形理學」包含名學、學與道學三類，學以下有「倫理學」、「政事學」及「文學」三支，而教育學為政事學之一支，與政學、法學、地政學等並列（圖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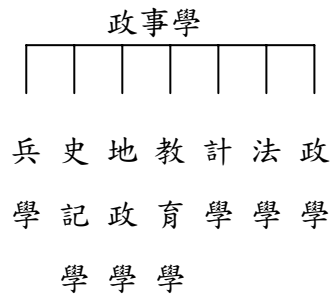


圖 4-1 「政事學」學目架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孫常緯編，《蔡元培先生全集》（續編），（台北：臺灣商務，1991 年），頁 108。

窺此架構，約略反映出類似晚清官方於《奏定大學堂章程》的看法，亦即認為教育學的性質傾向於「政事」。

教育學在上述學術架構中獲得定位後，蔡元培又依普通與專門之分別，列出「學級總表」（表 4-1），其「專門」中包含教育學：

表 4-1 蔡元培所列之「學級總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致用
普通	初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專門					教育學 專門學	幕僚 教育學	普通學教習 專門官 專門學教習
實業		農公學	商學		醫學/星學		農工/商/醫/天 文士

資料來源：孫常緯編，《蔡元培先生全集》（續編），頁 112。

蔡氏主張：「專門學卒業以後，專於實際者，試之於幕僚，而後授以官；長於理論者，宜進之以教育學，而後任教習」。¹³由此可知：第一，若受普通教育

¹³ 同前引書，頁 113。

以後授以教育學，則可任普通學教習；第二，專門學者可任專門官；第三，專門學者授以教育學，則可任專門學教習，而教育學適合長於理論者習之。此論反映出教育學的性質屬於專門與理論性質，而非普通性質，程度則在普通之上。

除上述分析外，蔡元培亦研擬師範速成學目表（見表 4-2）：

表 4-2 蔡元培所擬「師範速成科學目表」

大別名	通科	專科
名學	教育 倫理 歷史	名學、道學、文學
理學	教育 倫理	理學
學	教育	

資料來源：孫常緯編，《蔡元培先生全集》（續編），頁 118。

表 4-2 顯示，教育學雖屬具有學術性質的理論學目，然而在庚子之亂後，蔡氏的《學堂教科論》僅列出速成師範科的學目，其中教育為通科，作為名學、理學等專科的基礎。蔡元培雖認為教育學具有理論性質，但在他所研擬的學目表中，「教育學」的科目名稱為「教育」，但「教育」科目未被視為專科。

光緒二十九年（1903）三月，蔡元培撰〈釋仇滿〉一文，並發表於上海《蘇報》，此文正式表達蔡氏的民族主義立場。蔡氏於文中表示，中國人皆漢族，而所謂的「仇滿」，不為種族，而專指滿人特權，坐食多數人所生產者；¹⁴在抵禦外辱上，「出死以抵抗破壞之者，乃實在大多數之漢族」。¹⁵蔡氏認為：「夫民權之所趨，若決江河，沛然莫禦」。¹⁶顯示該晚清庚子以後，部分知識份子考察西方政治後，原本漢民族文化的認同，逐漸轉變為爭取主權的民族國家，¹⁷蔡元培亦受其影響，而其所謂「仇滿」，並不以滿人全族為號召，而是追求貴族、君主立憲以外，賦予人民權利的中國。¹⁸

為建設一人民具有主權的中國，蔡元培轉而學習西方文化，以學習西方文化的方式，提振中國文明。光緒三十二年冬（1906），蔡元培上〈為自費游學德國

¹⁴ 參見蔡元培，〈釋仇滿〉，收於孫常緯編，《蔡元培先生全集》，（台北：臺灣商務，1968），頁 437。

¹⁵ 同前引書，頁 437。

¹⁶ 同前引書，頁 439。

¹⁷ James Townsend.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7 (January 1992), pp. 111-112.

¹⁸ 參見蔡元培，〈釋仇滿〉，收於孫常緯編，《蔡元培先生全集》，頁 439。

請學部給予咨文呈〉，呈文曰：「編修蔡元培為以自費游學德國，呈請移咨學部給咨事……，竊職志在研究教育學」¹⁹。次年（1907）居柏林一年，學習德語。²⁰遷萊比錫後，於萊比錫大學研究文學、哲學、人類學、文化史、心理學、美學、民族學，進馮德的實驗心理學研究所，試驗各官能感覺的遲速；又進世界文明研究所，研究比較文明史。²¹蔡元培雖於游學前表示其職志在研究教育學，但實際學習內容則未及於教育學。

辛亥革命後，蔡元培歸國擔任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著手修改學制系統。這段期間，蔡元培對教育學內容與教育制度的討論，主要反映在教育方針與師範教育制度改革二部分。首先，蔡氏重新研議適合民國政體的教育方針，並於民國元年（1912）發表〈新教育意見〉一文。

文中，據蔡氏將軍國民主義、實利主義、德育主義三者，列為「隸屬於政治」之教育，而世界觀、美育主義則為「超軼乎政治」之教育。²²主要的分野，在於前者從政治立場出發，後者從人民立場出發：

專制時代（兼立憲而含專制性質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方針，以標準教育常為純粹之隸屬政治者，共和時代，教育家得立於人民之地位，以定標準，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²³

此種劃分方式，相較於晚清的中體西用政策，顯示教育方針已由「中西」之別，轉移到政治與超軼政治的分野上。這一點，反映出中國在面對西方文化的視野上，已不再以儒家文化為民族認同標幟，轉而以「共和政體」取代專制體制，而在內容部分，則由康德的哲學理論，提出道德、實利、軍國民等三大主義，並強調透過美育的實施，「不以一流派之哲學，一宗門之教育梏其心」²⁴，以培養一無方體、無終始之世界觀。顯示教育由先前的衝突與對立態度，²⁵轉而更大範

¹⁹ 據蔡元培先生手稿，收於孫常緯編著，《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上），頁 233。

²⁰ 同前引書，頁 235。

²¹ 同前引書，頁 240。

²² 參見蔡元培，〈新教育意見〉，《教育雜誌》，（第三年，第十一號，1912），頁總 3370。

²³ 同前引書，頁總 3364。

²⁴ 同前引書，頁總 3369。

²⁵ 參見黃書光，〈蔡元培的教育哲學〉，《中國文化月刊》，第 253 期，2001 年，頁 14。

圍地容納西方教育觀念。

為將上述依據西方理論而研擬出的教育方針進一步落實在各級教育制度中，蔡元培邀集國內各省教育要員共同討論教育問題，以視其主張是否適當。於是，同年（1912）蔡元培召開首次的臨時教育會議，並討論教育方針。此民國首次全國性教育會議，主要由教育部召開，將官、學二界組織成臨時性、全國性的教育團體。經審議後，多數議員贊成「以國家為中心，而不背世界進化之原則，並不妨個性之發展」。²⁶在內容部分，則僅接受道德教育以國家為中心，而以實利教育與軍國民教育輔之，至美育一層，加入中小學校、師範學校教則內。對於世界觀教育，贊成者頗少。²⁷

在此，蔡元培所主張的教育方針，宣示各級教育主要目標即為中國培育共和國民。從教育角度看，蔡元培此五大教育方針，亦顯示晚清清廷文化民族主義立場崩潰後，部分知識份子結合西方哲學理論，另創一適合本土的教育理論。此一學術路線，業已表露出教育學術開始和國家政策相結合。但此時教育學術與師範學校的教育學課程，依然沒有進一步的結合。

其次，就修訂師範教育政策言，蔡元培就任於教育總長期間，孫總統令教育部通告各省，將已設之優級、初級師範一併開學。文曰：「欲興辦中小學校非養成多數教員不可，雖一時權宜與永久經制自殊，而統籌全局亦不可顧此失彼。此時注重師範，既能消納中學以上之學生，復可隱植將來教育之根本，是真當務之急者」。²⁸

由於南京政府的師範教育政策轉向重視高等師範。臨時教育會議亦討論〈師範教育令案〉、〈劃分高等師範學區案及教育會組織綱要〉等案。²⁹其中主張將師範教育朝向高等師範的方向發展。辦法公布以後，同年（1912）曾留學日本的陳寶泉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³⁰，開始將北高師原有各科廢科改部，然而至民國三年（1915），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才增設教育專攻科，³¹四年畢業，聘用德人

²⁶ 參見我一，〈臨時教育會議日記〉，《教育雜誌》，（第四卷，第六號，1912），頁總 4127。

²⁷ 同前引書，頁總 4127-4128。

²⁸ 參見《教育雜誌》，（第三年，第十二期，1912），頁總 3471。

²⁹ 參見《教育雜誌》，（第四卷，第六號，1912），頁總 4121。

³⁰ 參見北京師範大學校史編寫組織，《北京師範大學校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1984），頁 21。

³¹ 同前引書，頁 23。

為教習，設置德語與教育科目，以學習德國教育學說。³²而民國二年（1913）頒佈的《高等師範學校規程》明訂在專修科以上，屬於學士學位層級的教育研究科，一直要到民國九年（1920），才首度創設於北京高師。³³另外，南京高師由於財政問題，民國二年（1913）才開始籌辦。³⁴民國四年（1915），郭秉文、陳容等人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歸國，郭氏開始協助南京高師校長江謙籌備南京高師開校事宜。³⁵民國七年（1918）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著手增設教育專修科。³⁶

在教科書編纂方面，民初教育部成立，為審查教科書，民國三年（1914），教育部公布《教科書編纂綱要審查會規程令》³⁷與《教授要目編纂會規程令》³⁸，規定教育部所定的各科教則，以及教育總長提出某科應採方針，為審查會審查之標準，³⁹而編纂類別中，包含「教育科」。⁴⁰如此一來，師範學校所用教科書為審定本。

除民初教育政策與教科書編纂情形外，在教育學界方面，正當南京政府研議將師範教育朝向高等師範的方向發展，教育學界內部的研究風氣已開始醞釀。其中，余箴發表〈學術與教育〉一文，以表明教育與學術彼此間相輔相成的關係：

教育之與學術須相輔而行，必有教育而後有學術可言，亦必有學術，而後有教育可言。如環無端，其間時不能有輕重緩急之別。無儕於學校事業，一方面不宜漠視，而於學術，一方面亦詎可淡忘耶。⁴¹

而氏所謂「學術」的意義，「則為以己之力，構成之，發明之，乃可言學術。若學校之所教，則僅傳述他人之結論，可謂為學術之豫備，而無與於學術也。……學術所要者，必置身於科學者之立腳地，而出以冷靜之頭腦，研究之眼光，則無

³² 同前引書，頁 24。

³³ 參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三）—高等教育，頁 185。

³⁴ 參見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南京：南京大學，2002），頁 47。

³⁵ 同前引書，頁 54。

³⁶ 同前引書，頁 84。

³⁷ 參見《教科書編纂綱要審查會規程令》，《教育雜誌》，（第六卷，第四號，1914），頁總 6844-6845。

³⁸ 參見《教授要目編纂會規程令》，《教育雜誌》，（第六卷，第四號，1914），頁總 6845-6846。

³⁹ 參見《教科書編纂綱要審查會規程令》，《教育雜誌》，（第六卷，第四號，1914），頁總 6844。

⁴⁰ 參見《教授要目編纂會規程令》，《教育雜誌》，（第六卷，第四號，1914），頁總 6845。

⁴¹ 參見余箴，〈學術與教育〉，《教育雜誌》，（第四卷，第十一號，1913），頁總 4581。

論見淺見深，自不失為學術也」。⁴²由余箴所述可以發現，學校固當傳授知識，但不可因此而淡忘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並且學術研究必須具備科學性，以創造、發明新知。

余箴的主張除說明教育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外，更是進一步對於教育學本身而發言，余氏認為：

教育學之能為科學否，今世學者雖或疑之，而研究教育之理論與實際，自是學術中之一端，惟必自學術之立腳地，以觀察教育與通俗之教育論，如予其人者，不能同日而語，此當讓諸一部份人士之研究。⁴³

基於此，余氏重申並非在社會安定元氣充足之日才提振學術：「若任一學術衰頹而不之挽救，使學校教育亦因之無從著手，則適足助長社會之腐敗而以矣。」

44

除此以外，賈豐臻亦認為中國因時勢變遷過多，教育者未能切實奉行，中國人做事往往有初鮮終、愛國心薄弱，以及教育觀念淺薄，導致教育思想未由發達。⁴⁵因此呼籲「教育界及早圖補救之方」⁴⁶。陳容亦認為中國思想之正軌，應強調：

使之自動，而又有永久之善惡者也。而此所謂正軌者非他，乃趨重物質科學與社會科學，以使國民能別是非，名善惡也是。⁴⁷

更有「師範者當採教育專業制，使得一心進行也」⁴⁸之議。此後有關教育學術的研究論著大多刊載於《教育雜誌》。

在師範學校的教育學研究方面，他們對於教育理論的研究較少，是由於民初戰事稍微平息，各界有待建設，教育遂重實際。如黃炎培視察各省教育建設情形

⁴² 同前引書，頁 4583。

⁴³ 同前引書，頁 4584。

⁴⁴ 同前引書，頁 4585。

⁴⁵ 參見賈豐臻，〈吾國教育思想不振之原因〉，《教育雜誌》，（第八卷，第三號，1916），頁總 9999-10003。

⁴⁶ 同前引書，頁總 10004。

⁴⁷ 參見陳容，〈現今我國思想應趨之正軌〉，《教育雜誌》，（第七卷，第一號，1915），頁總 8039。

⁴⁸ 參見孫增大，〈中國教育政策〉，《教育雜誌》，（第七卷，第二號，1915），頁總 8165。

後，積極提出在「使兒童在學校所受之教育，悉能適於社會生活之需要」⁴⁹；又參觀某師範學校時，謂：「所最可詫者，教育科講義，於理論刺刺不已，中間羅列教育家姓氏、學說，互數十紙未盡，至各科教授法、實習教授，全未暇及，而去畢業僅數月矣」。⁵⁰除此之外，更有「教育理論但知外國人名，而學說之取義未明」⁵¹的問題，因此，黃氏建議師範學校宜刪減教育理論的教學範圍。⁵²

師範學校對於教育學的研究方向，一直到民國四年九月（1915），教育部召開「全國師範學校校長聯合會」，教育總長提出諮詢的事項，仍多側重於國民人格教育與生活教育，透過師範教育以陶鑄國民之方，以及師範學校讀經教育等問題；而各師範學校校長所提意見，則多傾向整頓全國師範教材、課程及女子課程標準等。⁵³

並且在民國六年（1917）蔣維喬向教育部提出修改女子師範學校課程書中，仍建議教育科宜專重教授、管理等實用教材，「其屬於理論者，酌量減輕」。⁵⁴據此可以了解，官方之所以關注師範教育，在於藉師範教育陶鑄國民人格等功能，師範學生依然被視為「國民教育之命脈」⁵⁵，並以課程標準規定課程內容，進而達成統一教育的目的。而教育學界中則有傾向於官方立場者，注重教育的實用面，在官方確定教育方針後，並未進一步在制度上更大範圍提升師範教育的程度，而教育學亦未提升專科地位，且在官方的規劃與控制下，其性質更傾向於普通教育的配套。

二、教育會的學術傳播活動

雖然民初官方教育建設工作並未完全集中於師範教育，但各省教育會卻是積極運作，並以《教育雜誌》作為學界對話與溝通的平台，促使民初教育學術較晚清有更多的發展。

民國元年（1912），教育部重行頒訂《教育會規程》使教育會的性質有所更

⁴⁹ 參見黃炎培，〈採用實用主義〉，《教育雜誌》，（第五卷，第七號，1913），頁總 5537。

⁵⁰ 參見黃炎培，〈學校採用實用主義之商榷〉，《教育雜誌》，（第五卷，第七號，1913），頁總 5640。

⁵¹ 同前引書，頁總 5641。

⁵² 同前引書，頁總 5640。

⁵³ 參見《教育雜誌》，（第七卷，第九號，1915），頁總 9224-9225。

⁵⁴ 參見蔣維喬，〈致袁次長觀瀾論修改女子師範學校課程書〉，《教育雜誌》，（第九卷，第七號，1917），頁總 12289。

⁵⁵ 參見朱元善，〈整理師範課程〉，《教育雜誌》，（第七卷，第三號，1915），頁總 8303。

變。其〈總則〉第一條規定：「教育會以研究教育事項，力圖教育發達為目的」⁵⁶，並規定教育會實際運作的方式有：1.將研究所得建議於教育官廳；2.處理教育官廳委任事物；3.為講求各項學術及開通地方風氣，得分設各項研究會或講演、講習會各項。⁵⁷上述規則相較於晚清〈奏定各省教育會章程摺〉，⁵⁸教育會研究教育功能更為加強，而原有支援教育行政的功能，則部分歸於各縣勸學所辦理。

59

民初教育會在晚清的組織架構下進行重組與發展，部分地方教育會在《教育會規程》頒布以後，多進行人事及組織重整、籌措經費與學款等事務。例如江蘇教育總會舉定張謇為會長，王同愈為副會長；⁶⁰浙江省教育會舉定章太炎為正會長，全浙教育總會並公舉章太炎為正會長；江西新教育總會正會長李端清，⁶¹鎮江教育會吳棠、柳翼謀（詒徵）各當選為正副會長；⁶²其他如蘇州新教育會亦進行重組等工作⁶³。

另外，在教育學術的傳播方面，則可約略歸納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省教育會會員在教育刊物上撰文，推廣教育知識；第二、教育會邀請國內外教育學者蒞會，宣講各種教育學說，並在部分省區內展開教育改革運動；第三，部分省教育會主動組織為全國性教育會聯合會。茲分述如下。

第一，為了解各省教育會重要要員略歷，茲以民國元年（1912）中央臨時教育會議與會議員名單為例，其中有湖北代表議員李步青、江蘇代表議員楊保恆、黃炎培、賈豐臻、俞子夷、莊俞；直隸代表議員陳寶泉、侯鴻鑑；浙江代表葉翰（浩吾）、福建代表議員嚴復等人。⁶⁴其中，賈豐臻為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⁶⁵，

⁵⁶ 參見〈民國元年九月六日部令第八號《教育會規程》〉。收於教育部編，《中華民國教育法規彙編》，頁 84-85。

⁵⁷ 同前引註。

⁵⁸ 晚清教育會宗旨「在於輔助教育行政，圖教育之普及，並與學務公所及勸學所聯絡一氣」。參見〈學部奏定各省教育會章程摺〉，收於多賀秋五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清末編），頁 430-431。

⁵⁹ 《勸學所規程》第一條：「各縣設勸學所輔佐知事辦理縣教育行政事宜，並綜核各自治區教育事務」。參見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呈准《勸學所規程》，參見教育部編，《中華民國教育法規彙編》，頁 293。

⁶⁰ 參見〈學事一束〉，《教育雜誌》，（第四卷，第六號，1912），頁總 4146。

⁶¹ 參見〈學事一束〉，《教育雜誌》，（第四年，第四期，1912），頁總 3918。

⁶² 參見〈學事一束〉，《教育雜誌》，（第三年，第十期，1912），頁總 3321。

⁶³ 參見〈學事一束〉，《教育雜誌》，（第三年，第十一期，1912），頁總 3394-3395。

⁶⁴ 〈附臨時教育會議議員名單〉，參見《教育雜誌》，（第四卷，第六號，1912），頁總 4135-4136。

⁶⁵ 參見北京師範大學校史編寫組織，《北京師範大學校史（1902-1982）》，頁 24。

侯鴻鑑則為江蘇省無錫縣教育會會長⁶⁶。又這些參與民國第一次中央教育會的成員中，李步青、楊保恆、賈豐臻、陳寶泉、侯鴻鑑等人，皆於晚清留學政策初興時期(1902-1903)，赴東京宏文學院師範科學習速成師範，⁶⁷返國以後成為各省、縣教育會中的要角。民國六年(1917)，教育部公布《教育廳暫行條例》，⁶⁸李步青獲派教育部視學，沈恩孚獲派江蘇教育會駐會書記，並任命蔣維喬為教育部參事，⁶⁹成為國家的教育行政官員。

在教育刊物上撰文，以推廣教育知識部分，上述學習德國或日本教育的知識份子，從民國成立以後，便陸續在《教育雜誌》上撰文，使《教育雜誌》一時成為教育輿論、時事與觀念傳播與交流的平台。以賈豐臻與為例，其撰多篇與教育學相關的議論性文章，其篇名如後：

〈道德教育〉(第四卷，第九號)

〈教育上之信仰宗教觀〉(第五卷，第四期)

〈裴司泰洛齊傳〉(第五卷，第五期)

〈教育萬能說〉(第六卷，第一號)

〈鍛鍊主義之教育〉(第七卷，第六號)

〈實行軍國民教育之方法〉(第七卷，第七期)

〈哲學與教育〉(第七卷，第十二期)

〈吾國教育思想不振之原因〉(第八卷，第三號)

〈理想之教育〉(第八卷，第四期)

〈童子軍與教育主義〉(第八卷，第十期)

〈日本工業教育家手島精一之歷史〉(第十卷，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第七期)

〈教育宜保存國粹〉(第十卷，第二期)

〈教育的人生觀〉(第十一卷，第四期)

⁶⁶ 參見趙永良主編，《無錫名人辭典》，頁132-133。

⁶⁷ 參見房兆楹輯，《清末民初洋學學生題名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頁24-53。

⁶⁸ 民國六年九月六日教令第十四號《教育廳暫行條例》。參見教育部編，《中華民國教育法規彙編》，頁6。

⁶⁹ 參見《教育雜誌》，(第九卷，第十號，1917)，頁總12682。

另外，李步青《新制度教育史》於1915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而郭秉文的博士論文《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1916年於上海出版。⁷⁰

第二，在透過邀請國內外教育學者來華宣講，以吸收教育學理、實施教育改革方面，江蘇省教育會的會務運作與組織型態較具規模，故以其為例說明之。

民國三年（1914），美國教育家孟祿（Paul Monroe, 1869-1947）來中國參觀江蘇學校，江蘇教育會教育司長黃炎培交涉接待；⁷¹同年，江蘇省武進市教育會有鑑於近來學校與社會生活無密切之效驗，正會長莊俞提議實施實用主義，眾皆贊成；⁷²會議議程中，有關教育研究問題，亦徵集會員意見，以編輯教育會年報。⁷³雖然於此期間，各省教育會經費難以維持學務，江蘇教育司長黃炎培因而呈請辭職，⁷⁴並聯合呈請設置教育獨立官廳，以維持學務，⁷⁵各省教育會仍在艱難中維持會務，並於暑假期間延請中外通人演講學術，例如請德文教員格勒爾講演德國小學教授法，黃炎培報告考察贛、皖、湘三省教育情狀。⁷⁶是年，郭秉文（博士）、李松濤（碩士）、王啓明（碩士）、陳容（學士）等人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歸國，⁷⁷亦請郭秉文逐日分講學校衛生、學校管理兩門。⁷⁸翌年（1915）江蘇省教育會通知各縣市鄉教育會組織教育研究部，研究報告刊送小學校與各省教育會，以備采入教育研究雜誌。⁷⁹民國五年（1916）江蘇省教育會延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瑟婁博士（Dr. Sailer）演講對中國教育及世界教育之比較研究，以告國人俾於教育方針之所抉擇，演講中，瑟婁極其強調中國應實施實用主義教育，以去除學校教育與職業二者間之障礙，並謂：

中國教育較他國多一重困難，蓋他國不過發揮國粹而已，中國於保存國粹

⁷⁰ 參見郭秉文，《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上海：上海書店，1991）。翻印自商務印書館1922年版。1922年達3版。

⁷¹ 參見〈學事一束〉，《教育雜誌》，（第五卷，第四號，1913），頁總5272。

⁷² 參見〈學事一束〉，《教育雜誌》，（第五卷，第十號，1914），頁總5960。

⁷³ 參見〈學事一束〉，《教育雜誌》，（第五卷，第十號，1914），頁總5962。

⁷⁴ 參見〈學事一束〉，《教育雜誌》，（第五卷，第十一號，1914），頁總6098。

⁷⁵ 參見〈學事一束〉，《教育雜誌》，（第六卷，第四號，1914），頁總6852。

⁷⁶ 參見〈學事一束〉，《教育雜誌》，（第六卷，第五號，1914），頁總6990。

⁷⁷ 參見〈學事一束〉，《教育雜誌》，（第六卷，第四號，1914），頁總6856。

⁷⁸ 參見〈學事一束〉，《教育雜誌》，（第六卷，第九號，1914），頁總7542。

⁷⁹ 參見〈學事一束〉，《教育雜誌》，（第七卷，第三號，1915），頁總8394。

外，尚須吸收外邦文明，二者不可偏廢，此其所以難也。⁸⁰

因此，他認為：

教育家分兩種，一為理論家，一為實行家。前者專事發揮高深之學理，後者之主張，但以其所施切於實用為斷，不注重多讀書，中國現時以後者尤要。⁸¹

民國五年，江蘇省教育會附設教育講演練習所，所講學課定為教育原理、地方教育行政、社會心理、講演法、衛生大意、社會服務、社會經濟大意、講演實驗等。⁸²民國六年（1917），北京市清華學校邀請中美交換講員美國普仁斯頓大學歷史教育講師麥顧黎博士赴北京講演，亦受邀前往江蘇省教育會講演，講題為「共和國之教育」，麥顧黎認為欲養成共和國民，需發展生產能力，因此，農工商教育務用科學之方法。⁸³同年，陳筱莊、郭鴻聲、張綬青等赴菲律賓考察職業教育歸國，亦蒞會演說。⁸⁴

除江蘇教育會外，民國四年（1915），寰球中國學生會邀請黃韜之講述發起實用主義第一年大概情形。黃謂：「各校教育多有不適用實用，致出校學生不易得職業，若長此以往，欲為子弟謀職業者，將以學校為畏途」，此事之乃至關緊要者。⁸⁵民國五年（1916），袁世凱稱帝失敗以後，寰球學生會請江蘇第二師範校長賈季英演說人格教育，目的在於使人人得高尚之人格，進與世界各強國並駕齊驅。⁸⁶

而河北省京兆勸學所自取銷後，學務一落千丈，民國五年（1916）王志襄蒞任後，將原有的勸學所擴充為勸學研究會，融合學理與輿情，辦學宗旨首重取實

⁸⁰ 參見張世鑾，〈聽美國瑟婁博士講演中國教育記〉，《教育雜誌》，（第八卷，第三號，1916），頁總 10100。

⁸¹ 同前引書，頁總 10105。

⁸² 參見〈學事一束〉，《教育雜誌》，（第八卷，第四號，1916），頁總 10210。

⁸³ 參見〈學事一束〉，《教育雜誌》，（第九卷，第一號，1917），頁總 11488。

⁸⁴ 參見〈學事一束〉，《教育雜誌》，（第九卷，第一號，1917），頁總 11881。

⁸⁵ 參見〈學事一束〉，《教育雜誌》，（第七卷，第二號，1915），頁總 8260。

⁸⁶ 參見〈學事一束〉，《教育雜誌》，（第八卷，第八號，1916），頁總 10789-10790。

用主義，重經驗以利實行。⁸⁷

民國六年，全紹教育會聯合會開第一次會，謂「欲開民智，不可不從宣講著手」，並提議以各教育會酌派會員為宣講員的方式最佳。⁸⁸

最後，在各省教育會主動組織為全國性教育會方面，民國三年（1914），直隸省教育會鑑於歐洲戰事方殷，中國人宜乘此時機，力籌生聚教訓之方，取得事半功倍之效，便邀集各省教育家，聯絡各省教育會，請教育部速開全國教育會聯合會。⁸⁹於是，民國四年夏（1915），由直隸省教育會所發起的全國省教育會第一次聯合會於天津召開，討論教育界研究性質，⁹⁰該會議將議員分為甲、乙兩組審查門類，甲組包含小學教育、師範教育、中學及女學教育；乙組則有實業教育、專門教育、社會教育及教育行政。議決之結果分項建議於教育部、通告各省教育會，或後續徵集各省教育會意見。⁹¹於是，在各省教育會組織成立了全國性教育會組織。民國八年（1919），教育部更公布全國教育會聯合會議決案，令各省教育會派員考察國外，⁹²至此，形成由各國至中國，中國與各省之間教育事務的輸入、交流管道。

由上述發展可知，民初教育家除了撰寫教育學相關專書與文章，透過《教育雜誌》與出版刊物傳播教育學及教育史的知識外，也開始與中央及地方教育行政官員與團體進行對話，以研議民國教育的發展方向，此等皆顯示教育學界的知識交流與聯繫益加活絡。

綜上所述可知，民初教育學的發展，在師範學校方面，因為學術研究的條件較為貧乏，並由於師範教育主要在培育普通教育所需師資，因此教育學被界定屬「實用」與「政事」兩種性質。而民間的教育會組織日益擴大，並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更彙集教育家集聚力量，組成全國省教育會聯合會，邀請外國教育家來華宣講教育學說，促使教育會成為聯繫中國與他國教育文化界的一個交流管道，藉此引進他國教育學說以助本國的教育改革；並透過專書、期刊專文等方式，

⁸⁷ 參見〈學事一束〉，《教育雜誌》，（第八卷，第四號，1916），頁總 10212。

⁸⁸ 參見〈學事一束〉，《教育雜誌》，（第九卷，第七號，1917），頁總 12276。

⁸⁹ 參見〈學事一束〉，《教育雜誌》，（第六卷，第九號，1914），頁總 7543-7544。

⁹⁰ 記者，〈全國省教育會第一次聯合會記〉，參見《教育雜誌》，（第七卷，第六號，1915），頁總 8816。

⁹¹ 記者，〈全國省教育會第一次聯合會記〉，參見《教育雜誌》，（第七卷，第六號，1915），頁總 8818-8819。

⁹² 參見〈學事一束〉，《教育雜誌》，（第十一卷，第二號，1919），頁總 14824。

在各教育會中宣傳實用主義等思想，而這些學術思潮，在民初亟需發展實業、科學與生產建設的社會背景下，被吸收並廣泛地傳播。由於上述教育活動，重申以學術、教育為改革根本，促進中國文明進化的主張，亦反映出菁英民族主義的集體意識民初時仍擴散於知識份子之間。

第二節 從擴大學術領域到「實用」建國 —以教育學學門為中心

民初教育學術研究的方向，起初受到蔡元培教育宗旨中提倡美育的影響，由巽吾翻譯美國哈勃登大學心理教師潑洛歇氏原著的《藝術教育之原理》，⁹³分期刊載於《教育雜誌》中。然而，官方教育宗旨的內容，於民國的最初幾年，並未更進一步激發教育學界去引介西國教育學說。實際上，教育學界內部積極討論的各項研究課題，主要有實驗教育學研究的萌芽、更深入討論教育學與各學門之間的關係，以及探討勤勞與實用的教育思想，茲討論如後。

一、實驗教育學研究的萌芽

民初所引介的外國實驗教育學說，文章為數不豐，與實驗教育學研究法相關者，僅有〈各國實驗教育學之現狀〉與〈兒童研究〉二篇。

首先，在天民所撰〈各國實驗教育學之現狀〉一文中，其略述歐美先進各國實驗教育學的研究情形，這些國家包括德意志、法蘭西、美利堅、日本等國。窺其內容，多屬粗略介紹各國實驗教育學相關研究學者、組織學術刊物之事，以說明二十世紀初期，各國競相採取心理學與教育學相互結合的研究趨勢與結果。⁹⁴在德意志方面，介紹萊比錫、美爾西摩等教育會，集合教育學家及心理學家的研究結果，柯爾德遜等人組織並出版《實驗教育學》雜誌。其後與《教育心理學雜誌》合併，改名《教育心理學及實驗教育學雜誌》。⁹⁵

法國方面，介紹索爾本大學教授比勒氏專著於教育實際，1908年巴黎高等師範學校以兒童為實際研究的研究對象，設一學校衛生實驗場。⁹⁶在美國方面，介紹克拉克大學教授華爾氏首先開啓美國兒童心理研究之風，於其所主持之教育學演習中竭力鼓吹兒童心理學，並創辦一美國心理學雜誌，另有《心理學評論》、《兒童學》、《青年研究》與《教育學評論》等雜誌，又有《教育的心理學雜誌》。

⁹³ 巽吾譯，〈藝術教育之原理〉，《教育雜誌》，（第四卷，第一期，1912）；（第四卷，第二期，1912年）；（第四卷，第六號，1912）。

⁹⁴ 參見天民，〈各國實驗教育學之現狀〉，《教育雜誌》，（第四卷，第十期，1913）。

⁹⁵ 同前引書，頁總 4518。

⁹⁶ 同前引書，頁總 4520。

⁹⁷日本方面，介紹實驗派教育學輸入於日本之教育社會，始於明治十九年(1886)，其時《教育學術界》臨時增刊，揭載吉田熊次所撰〈所謂實驗教育學何耶〉，而成爲日本提倡實驗教育學的開端。⁹⁸

由於國際間相繼興起實驗教育學的研究趨勢，天民認爲：「教育學之實驗研究，各先進國皆在發達極勝之時，非如我國之教育家，尚在幼稚時代也。蓋有根柢之教育研究，若非得確實之實驗視察，絕無結果也。」⁹⁹此處反映部分知識份子極盼中國能積極振興實驗教育學，以幫助中國教育學早日脫離「幼稚時代」的想法。

其二，志厚另外在〈兒童研究〉一文中，由「教育方法」切入討論，該文曰：

自來以科學攻教育者，取道有二。一論其鵠，一論其法。昔之哲學家，或教育學家，以孜孜研究者，恆在教育之鵠……，異說紛蕃。……至若教育方法，古人殆罕措意，叩以某歲之兒，所注重者何在，所應教者何事。古代教育學，未能有以詔示無儕也，逮於近世，研究教育方法者，非無其人，然……是否確有科學之根柢，究難置信。¹⁰⁰

上述志厚一文的核心觀念，在於提倡以「科學」爲根柢的方法來研究教育。是故，志厚表示：「今之教育學，欲求基址堅實，乃移其研究之苦心，以向教育方法論。此中，門類固夥，而根柢中之根柢，則所謂『兒童研究』」。¹⁰¹

然而，其所謂的「教育方法論」，亦即研究教育的方法，皆須具備科學根據。志厚進一步說明，實驗教育學派的德國教育學者莫曼氏，認爲：「曰『兒童研究』範圍較狹，而曰『實驗教育學』，則不但以兒童身心爲研究之對象，又教育上種種實際問題，亦當在研究之列」。¹⁰²因此，除了限定以學校兒童爲研究主體外，舉凡兒童發展、觀察力、疲憊、記憶、反應時間、學校教科的類似性，皆列爲研

⁹⁷ 同前引書，頁總 4520。

⁹⁸ 同前引書，頁總 4522。

⁹⁹ 同前引書。

¹⁰⁰ 參見志厚，〈兒童研究〉，《教育雜誌》，(第六卷，第一號，1914)，頁總 6337。

¹⁰¹ 同前引書。

¹⁰² 同前引書，頁總 6339。

究事項。¹⁰³由此可以了解，兒童研究與實驗教育學的差別，在於研究對象不同，至於方法，則同樣採取實驗研究的方法。

在重視教育方法、劃定研究對象與範圍以外，志厚進一步確定實驗教育學具備科學性，在於：

莫曼之實驗教育學，雖概自心理學、病理學、倫理學、名學、美學及「兒童研究」之中，採用其研究結果，然斯學自身，本有特定之範圍，故仍不失為獨立之科學，蓋科學資格，必若何而始，誠難言之，寧為便於研究計，遂但就其範圍及方法，較異於他科學者，名之為一科學耳。¹⁰⁴

由此可知，西方的實驗教育學，首先出現於二十世紀初期的歐美等地的教育研究機構，主要是由於心理學研究的發展與突破，實驗方法進一步影響教育學，當發展出的新興研究領域後，再傳播至日本與中國。另外，從學科發展的角度言之，自晚清輸入西方教育學以來，教育學是否合乎科學性的問題，業已出現，而民初對教育學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問題，實驗教育學者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其所用方法合乎科學性，而實驗教育學又具備特定的範圍及方法。

二、教育學與其他學門的關係

民國初年對於教育學門與其他學門關係的討論，也有許多發展，並且主要在於討論教育學與哲學、社會學等學術領域間的關係。首先，在教育學與各學門之間的關係方面，志厚依萊因與巴特二氏之說，認為赫爾巴特教育學，僅藉由倫理學與心理學，而欲圖「欲進教育學於科學之地位」之完成，範圍太過狹隘，因此，志厚主張擴大範圍，及於政學與醫學。其云：

然最近之教育學說，則不以此單純之解決法為足，更進而拓其範圍，以為廣義之政學（賅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等而言），及廣義之醫學（賅純正

¹⁰³ 本文譯自英國羅白氏《實驗教育學》之一。參見天一譯，〈實驗教育學〉，《教育雜誌》，（第四卷，第四號，1912），頁總 3874-3881。

¹⁰⁴ 同前引書，頁總 6339。

醫學、生理學、生物學、衛生學等而言)，皆與教育學有重大之關係。¹⁰⁵

因此，教育學乃「建設於倫理學、心理學之上者，又旁與醫學接近，且宜推廣其接觸之範圍，以及乎宗教、哲學、美學、名學、政治學。」¹⁰⁶而教育學與美學及名學的關係有二，第一，「不獨欲於哲學一部份之上，建設教育學，而欲以哲學全體，為教育學之基址也」。¹⁰⁷因此，倫理學可陶冶意志，名學陶冶思想，美學則陶冶人之感情。第二，從教育學本身考察，蘭因認為，倫理學較相近於規範科學，名學與美學則否。¹⁰⁸志厚則提出，近代學者主張名學規定思想之普遍標準，美學規定普遍的審美標準者，因此，三者皆為規範科學；¹⁰⁹而「倫理學、名學、美學三者，言其關係，則為獨立，其實質，則為和體。三者接對吾人究竟目的之理念，而有共同作用之關係」，以謀精神本質的調和發展。¹¹⁰

至於教育學與政治學的關係，則在於皆以道義為中心，同屬於國家內政的範圍，教育學當以此權能，以養成「國民之理想的活力為第一義」。¹¹¹

除此之外，志厚的描述中，亦出現了「基礎科學」、「補助科學」等不同用語。例如，他表示，生理學與衛生學為教育學之補助科學，這是因為教育者除了需了解受教者的精神生活，亦需具備受教者身體發達的相關知識。¹¹²不過：

雖然生理、衛生學等，之與教育學有關，但立於補助科學之地位，而不似倫理學、心理學之立於基址科學之地位，此又不可不知，蓋教育學之為學，本以精神陶冶為主者也。¹¹³

由上述可知，欲釐清其他學門與教育學的關係，是否被歸類於補助科學或基址科學，端賴教育學本身，是人類精神生活自有「絕對價值」與「獨立價值」之

¹⁰⁵ 參見志厚，〈教育學與各科學之關係〉，《教育雜誌》，（第六卷，第十二號，1914），頁總 7897。

¹⁰⁶ 具志厚描述，此說主要出自蘭因氏，而巴特氏亦有「足與此相發明者，故併舉之」。同前引書，頁總 7905。

¹⁰⁷ 同前引書，頁總 7902。

¹⁰⁸ 同前引書，頁總 7903。

¹⁰⁹ 同前引書，頁總 7904。

¹¹⁰ 同前引書。

¹¹¹ 同前引書。

¹¹² 同前引書，頁總 7900。

¹¹³ 同前引書，頁總 7900-7901。

所在，¹¹⁴因此，「教育之為學，當求其主義於精神科學（按此指倫理學及心理學）」¹¹⁵。

準此，志厚進一步討論教育學與哲學之間的關係。他採納莫曼之言，表示「實驗教育學，非教育學之全體也」，¹¹⁶認為「不有哲學之根本思想，烏足以建設教育」¹¹⁷，並檢視機械觀與理想觀之差異，敘述由於哲學上不同宇宙觀，對十七世紀以來教育學發展所產生的影響，以此謂「近代哲學思想與教育主義之變遷大勢，而二者之關係，亦從而得知」¹¹⁸。

由上述可知，志厚擴大了教育學與其他學門的關係，他除主張以哲學全體作為教育學的基礎外，並將教育學的性質歸於精神科學。此外，更將相關學門擴及政治學、生理學、宗教學等範圍。另有太玄亦討論此主題，但不同的是太玄反對專以倫理學角度出發，而主張應轉向探討實際的教育問題。太玄認為，應「捨倫理學，而易以廣義之生理學」¹¹⁹，主要的原因在於，「倫理學者，其所研究之事，蕃變無方，且斯學之於道德，其向日研究方法，尚未得云完全無憾，非更俟心理學、社會學之見解，十分明確以後，恐道德問題，終莫得而解決焉。」¹²⁰

除了倫理學研究方法未臻完全以外，¹²¹由教育學的研究趨勢而言，在西方教育學成立之時，已在哲學的研究範疇之內，此後，則逐漸遠離哲學，而轉向社會的教育學，以及實驗教育學。¹²²然而，社會的教育學者，雖知教育問題之規範宜由社會規範中求得，然而並未有明確的解釋，¹²³太玄云：

實驗教育學，欲由從來之演繹法，一轉而入於歸納之途，此自教育學言，

¹¹⁴ 同前引書，頁總 7901。

¹¹⁵ 同前引書，頁總 7900-7901。

¹¹⁶ 參見志厚，〈近世教育與哲學之關係〉，《教育雜誌》，（第八卷，第三號，1916年），頁總 10025。

¹¹⁷ 同前引書，頁總 10025。

¹¹⁸ 參見志厚，〈近世教育與哲學之關係〉（續），《教育雜誌》，（第八卷，第四號，1916年），頁總 10179。

¹¹⁹ 參見太玄，〈教育學與社會學〉，《教育雜誌》，（第九卷，第一號，1917年），頁總 11437。

¹²⁰ 同前引書，頁總 11437-11438。

¹²¹ 據太玄所述，當時的倫理學研究，逐漸由分析方式轉向實踐倫理學，然而亦為分析的形式而已：「既知義務之所以為義務，然如何而實現此義務乎？欲踐此義務，又必有其資格焉，其準備為何，是皆今日倫理學之所不能達也」。參見太玄，〈教育學與社會學〉，《教育雜誌》，（第九卷，第二號，1917年），頁總 11559-11560。

¹²² 同前引書，頁總 11443。

¹²³ 同前引書。

誠有可謂為進步者。然實驗上所得事實，殆不能視為規範的，且實驗法之有裨於教育學者，寧多存於教授法，一面欲於教育問題中，求可為社會的實理的規範者，自不能期之於實驗教育學，而別有所待矣。¹²⁴

基於上述，太玄認為教育之事，應研究與人之身體有關的廣義生理學，¹²⁵因此，將心理學、生理學與社會學三者，列為「教育學之基礎學科」¹²⁶。而此三者之間的關係，則為：

心理、生理二學，研究個人身心，個人云者，教育之客體也，而社會學與教育學之關係，則不在教育之客體，乃就何以教育此客體之方針、目的，詮釋其原理者也，故苟以次第論，則謂教育學之基礎學科，第一為生理學，第二為心理學，第三為社會學，可也。¹²⁷

據此，太玄進一步討論教育學與社會學之間的關係，他認為由於倫理學無法為社會行為規範資格、條件與方法等教育問題提出具體的改善之方，¹²⁸而社會學作為教育學的基礎學門之一，則可執科學態度，以研究社會實體，而所謂「社會實體」，太玄的解釋為：「曰家，曰國」。¹²⁹因此，「教育問題，必以社會學為基礎，而解決之」¹³⁰，如此一來，太玄所提出的主張，為教育學的基礎學門另外開啓了社會學研究的領域；在方法方面，太玄進一步說明，宜採社會學之研究法，亦即觀察法、歷史考察法、比較法及統計法，¹³¹並謂：

尤不得不就人間生活之實際，進而為普遍且透徹之研究，又其研究方法，則當為具體的，而非抽象的，又為客觀的，而非主觀的，夫如是，乃可謂

¹²⁴ 同前引書，頁總 11443。

¹²⁵ 同前引書，頁總 11438。

¹²⁶ 同前引書。

¹²⁷ 同前引書。

¹²⁸ 同前引書，頁總 11560。

¹²⁹ 同前引書，頁總 11438。

¹³⁰ 同前引書。

¹³¹ 同前引書，頁總 11442。

之實理的研究。¹³²

基於上述可知，有關民初教育學與其他學門間關係的討論，雖受蘭因、巴特二氏學說影響，開始區隔「基礎學科」與「輔助學科」，但實際的發展情形則是針對基礎學科，尤其是哲學與社會學二方面。在哲學方面，有學者主張更擴大範圍，除原有倫理學外，更將哲學全體納入，尤其是名學與美學，使哲學成為建設教育學的基礎；在社會學方面，有人則反對倫理學所採取過於抽象的分析方式，以及實驗教育學僅能在教授法提供助益，卻無法回答社會整體的教育方針等問題，因此主張轉向以統計、觀察等科學方法，研究具體而實際的教育問題，為形成具體的社會規範、社會實理而努力。

除《教育雜誌》介紹外國教育學的研究趨勢外，正當留日教育學者參與規劃國家教育制度時，部分留美歸國的教育學者也進入師範學校，而採取有別於赫爾巴特教育學的觀點，開始改革教育學的課程，主張根據於自然科學的典範，促使教育學科學化。此部分的工作，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為主要的改革地，其推動者為留美回國的陶行知。

陶行知於 1914 年畢業於金陵大學，赴美後先獲伊利諾大學攻讀市政學，獲政治學碩士學位，隨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進步主義教育家克伯屈（William H. Kilpatrick, 1871-1965）、教育史家孟祿（Paul Monroe, 1869-1947）學習教育，終獲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都市學務總監資格證書」（The Certificate for Inspectorship-General in Metropolitan Education Affairs），¹³³歸國以後，受聘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當時，同為哥倫比亞大學歸國的郭秉文擔任校長，陶行知受郭氏之邀歸國，受聘於南京高師，教授教育學、教育行政、教育統計等課。¹³⁴當時，南京高師雖於民國四年（1915）才創校，在最初幾年內，課程的安排卻偏重於學生畢業後從事教育工作的「直接」需要。陶行知進入南京高師後，由於反對「沿用舊法、儀型外國」¹³⁵，極力倡導「教育學要科學化」¹³⁶，因此，陶氏提

¹³² 同前引書，頁總 11561。

¹³³ 參見曹常仁，《陶行知師範教育思想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學位論文，台北：未出版，1998，頁 20。

¹³⁴ 參見王德滋編，《南京大學百年史》，頁 81。

¹³⁵ 參見朱斐主編，《東南大學史—1902-1949（第一卷）》，（南京：東南大學，1991），頁 63。

¹³⁶ 同前引書，頁 63。

出「教育的理論應根植於自然科學，並把教育學的研究成果，廣泛地運用到實踐中去」¹³⁷。

陶行知兼任教育專修科主任後，開始著手改革教育專修科的課程，主要的特點在於，將「科學常識」列為教育科必修課程。為達教育學科學化的目標，陶氏由國外請來著名心理學家、美國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陸志韋教授講授多種心理學，偉斯特大學著名的神經學研究員秉志講授生物學與生理學，¹³⁸陶行知講授遺傳學，另外，請廖世承、孟憲承、陳鶴琴、俞子夷、徐則陵、程其保等學者開設教育學、哲學教育、教育心理學、兒童教育、中學教育、教學法等課程。¹³⁹由此可見，由於教育學的理論基礎由哲學轉移到自然科學，教育專修科課程亦開始產生變化，更多的教育學輔助學科因此出現在教育學課程中。

三、注重「勤勞」的教育思想

民初時期的教育學，另外出現重視勤勞的教育思潮。此派思潮主要源自德國凱善西台奈（G. Kerschensteiner, 1854-1932）的教育學說。其中《教育雜誌》分期刊登志厚所撰〈凱善西台奈之教育說〉等文章。¹⁴⁰其中，討論凱善西台奈《公民教育論》、《學校組織論》二書內容，藉此提倡以國家為本位的教育理論。該文中強調職業教育、國民教育之本質，「以為國家所由有，教育者無他，欲令多數國民領會國家之職能。」¹⁴¹是故，凱氏曰：「近世之立憲國，日益發達，故尤不可不藉教育之力，以使大多數國民，能涵養其公民之思想、情感，與完全其公民之實踐行為」。¹⁴²

然而必須進一步說明的是，凱氏所指的「以為國家所由有」者，並非意謂以國家支配教育，因為，凱氏所謂之「公民教育」，其意涵為「與政黨政派問題無涉，一與政黨政派有涉，即不得目為公民教育」¹⁴³，而是著眼於經濟上、技術

¹³⁷ 同前引書。

¹³⁸ 同前引書，頁 63-64。

¹³⁹ 同前引書，頁 64。

¹⁴⁰ 參見志厚，〈凱善西台奈之教育說〉，《教育雜誌》，（第五卷，第十期，1914）。〈凱善西台奈之教育說〉（續），《教育雜誌》，（第五卷，第十一期，1914）。〈凱善西台奈之教育說〉（再續），《教育雜誌》，（第五卷，第十二期，1914），共三篇。

¹⁴¹ 參見志厚，〈凱善西台奈之教育說〉，《教育雜誌》，（第五卷，第十號，1914），頁總 5902。

¹⁴² 參見志厚，〈現代教育思潮〉，《教育雜誌》，（第七卷，第十一號，1915），頁總 9449。

¹⁴³ 參見志厚，〈現代教育思潮〉，《教育雜誌》，（第七卷，第十一號，1915），頁總 9450。

上，體會公民之精神，完成公民之活動。¹⁴⁴在如此的基礎上，承認精神生活之根本存於意志活動，故在教育上，主張凡人判斷及認識之價值，皆由實行而決定，因此，教育方法上務必提倡勤勞，¹⁴⁵並切重實行。

在此注重實行的觀念指導下，於教育方法上，《教育雜誌》更進一步譯介、推行為數頗多的「勤勞教育」、「手工教育」等施行方法，以對內建設國家，其相關刊文有：

天民譯，〈手工教育論〉，第六卷之第七號、第八號、第九號、第十號、第十一號、第十二號

天民譯，〈勤勞教育論〉，第七卷之第一號、第四號、第六號、第九號、第十號，第十一號

莊俞，〈勤勞主義與訓育〉，第七卷，第九號

天民，〈勤勞學校之實際設施〉，第八卷之第一號、第二號

天民譯，〈公民教育論〉，第八卷之第五期、第六期

天民，〈德國之公民教育〉，第八卷之第七期、第八期

由此可知，凱氏教育思想於民國成立初期，為教育界引介了「公民教育」的觀念，在晚清所倡議的國家主義、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教育之外，豎立了公民教育觀，以立定公民與國家之關係，及其所應遵行之活動。

四、注重「實用」的教育思想

民初時期除引介德國凱善西台奈的教育思想外，亦同時刊登英美實用主義相關學說，相關篇目如下：

黃炎培，〈採用實用主義〉，（第五卷，第七號，）

Charles W. Eliot. 原著，錢智修譯，〈實效教育論〉，（第六卷，第一號）

¹⁴⁴ 同前引書，頁總 9450。

¹⁴⁵ 參見志厚，〈凱善西台奈之教育學說〉（再續），《教育雜誌》，（第五卷，第十二號，1914），頁總 6178。

太玄，〈動的教育學〉，（第八卷，第一號）

黃炎培，〈採用實用主義之第二年〉，

太玄，〈實效主義之思潮〉，（第八卷，第二期）

黃炎培，〈實用主義產出之第三年〉，（第九卷，第一期）

由上文所示篇目，初步反映出民初所輸入的實用主義思潮名稱不一，有「實用」、「實效」、「動的教育學」等名稱。¹⁴⁶然而進一步分析其理論源流，則可以發現「實效主義」理論來源，主要有三。

第一，為斯賓塞的《教育論》，該書謂貴以物質的、精神的關於生活上之準備，使其能直接得生活上之實用。¹⁴⁷第二，為裴斯泰洛齊，其主張人不可不自求生活，教育家當與人以最良之方法，使人人能自營生活，則人人斯得為人之價值。¹⁴⁸第三，則有德人蒙塔尼蒙氏、廓美尼司及陸克（按：洛克）、路索（按：盧梭）等，附和其說，其推盪漸廣。¹⁴⁹並且，相關理論亦包含實用主義與新實在論，凡如經驗論、快樂說、功利說等，皆與實效教育相結合。¹⁵⁰而「實效」之內涵，主要意指二方面：

一謂改良方法，以增大教育之效果者；一謂變易從來之教育目的，由人格陶冶更進而注重社會的、實際的方面，施以直接關係於職業之教育者也。¹⁵¹

實用主義思潮引進後，雖其內容源流甚廣，然具體實踐活動亦已著手進行。其中，黃炎培首先在教育界中推行實用觀念，於刊行《實用主義小學教育法》，為了廣收教育界對實用主義的意見，亦發為問題，徵求海內意見，將其輯為《臨

¹⁴⁶ 〈動的教育學之建設〉一文，其謂「生活本位之教育」、「為訓練中心之教育」及「教材之職能論」三要項，強調「由兒童現時生活而出發，使滿足現時之需要，漸次高其評價之標準，卒使與現代之國民的理想相為一致。」由上述可發現，與凱善西台奈的教育說論點頗為相近，如此，亦可將所謂「動的教育學」歸屬實用、勤勞一派，更反映出民初翻譯學說時名詞不一的現象。參見太玄，〈動的教育學之建設〉，《教育雜誌》，（第八卷，第一號，1916），頁總 9749-9763。

¹⁴⁷ 黃炎培，〈採用實用主義〉，《教育雜誌》，（第五卷，第七期，1913），頁總 5538。

¹⁴⁸ 同前引書。

¹⁴⁹ 同前引書。

¹⁵⁰ 同前引書，頁總 9907。

¹⁵¹ 同前引書，頁總 9900。

時增刊》發行，與此同時，江蘇省教育會教育研究部將《實用主義小學教育法》與黃氏的第二回商榷書增刊發布，該省行政機關亦協助介紹。此時，實用主義思潮開始影響中國教育，例如山東省立第三師範學校使用《實用主義師範國文教本通論》、江蘇第二師範學校顧紹衣亦本實用主義編輯理科雜誌。¹⁵²除此之外，更用以施行在改革小學教育法、¹⁵³師範講授宜注重實用，並在教育政策上提倡興設實業教育機構。¹⁵⁴對此，郭秉文亦云：「昔日好文學及經學中之倫理，今日則推而及於西學之實驗以及致用之道矣，蓋國民主義與愛國主義之發展，不得不然之勢也。」¹⁵⁵

綜上所述，民初教育學的發展，部分師範學校課程改革僅屬單一特殊個案，整體而言，在政策的統一規劃下實際發展有限。然而教育會所譯介的教育學說，則有深入討論實驗教育學、教育學與其他學門的關係、注重勤勞的公民教育思潮，與注重實用的教育思潮四類，除積極將其付諸實踐於國民教育與師範教育機構外，更進一步指導職業教育改革方向。此時期的發展與晚清相較，學術色彩益加濃厚，並試圖由外國引進適合中國國情的教育學研究領域，以尋求國家建設的方向。

¹⁵² 參見黃炎培，〈實用主義產出之第一年〉，《教育雜誌》，（第七卷，第一號，1915），頁總 8022。

¹⁵³ 同前引書，頁總 8022-8023。

¹⁵⁴ 參見黃炎培，〈採用實用主義〉，《教育雜誌》，（第五卷，第七號，1913），頁總 5639-5640。

¹⁵⁵ 參見郭秉文，〈緒言〉，《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收於《民國叢書》第三編，（上海：上海書店，1991），頁 6。

第三節 從展望未來到求索專史 —以教育史學門為中心

民國成立以後，如本章第一節所述，教育史課程設置的主要陣地在師範學校，而師範學校師資來源上，仍有少量的教師來自於留學歸國的學者，因此受到課程設置與師資來源兩項外在因素的影響，促使教育史發展的一大動力，是來自對教科書審定本的需求上。此外，國內教育學者開始撰寫教育史的相關文章，但較為深入的教育史著作問世，主要由留學生所撰寫，依現有史料作較為深入的分析，則可表現出此時期教育史教科書與研究專書所具有的特點。以下從教科書與學者相關著作二方面，分別敘述民初教育史學門的發展情形。

一、期刊

除了教科書外，民初學者亦陸續於教育類刊物上發表教育史類文章，雖為數不多，內容偏重於中外教育家小傳，例如，《教育雜誌》有下列文章：

蔣維喬，〈王頌霖傳〉，第五卷，第十號

巽吾，〈康菩爾博士傳〉，第六卷，第二號。

錢智修，〈蒙台梭利女史小傳〉，第六卷，第三號。

太玄，〈美國大教育家依略脫傳〉，第六卷，第三號，第十一號，第十二號。

錢智修，〈德國大哲學家郁根傳〉，第七卷，第二號，第六號；第八卷，第三號，第八號，第十號。

莊俞、劉永齡，〈述印度教育家薩格碩士之言行〉，第七卷，第十二號。

錢智修，〈法國大哲學家布格遜傳〉，第八卷，第一號。

太玄，〈小學教師之託爾斯泰〉，第九卷，第一號，第二號。

在西洋教育家小傳部分，多描述教育家生平、教育事蹟或教育名言。其中，康菩爾博士為蘇格蘭盲人教育先驅。¹⁵⁶〈蒙台梭利女史小傳〉則是因氏之教授法

¹⁵⁶ 參見巽吾，〈康菩爾博士傳〉，《教育雜誌》，（第六卷，第二期，1914），頁總 6541。

繼風靡歐美、日本後，其「兒童之宅」(Case dei Bambini)新式學校緒餘傳入中國，¹⁵⁷該文藉史傳推介其學說。〈述印度教育家薩格碩士之言行〉一文，亦因氏之學說風行歐美，並赴江蘇省教育會青年會、寰球中國學生會等團體演講，¹⁵⁸莊俞、劉永齡摘述其演說內容而刊文。依略脫(Charles W. Eliot, 1834—1926)於1867年擔任哈佛大學校長期間，提倡學術自由與自治不遺餘力，為改革美國教育之先驅。¹⁵⁹而德國郁根(Rudolf Eucken)論人生哲學¹⁶⁰，法國布格遜(Henri Bergson, 1859-時年57)論物質與精神關係，¹⁶¹二者皆被稱為「二十世紀世界哲學家之山斗」。¹⁶²總之，當時所介紹諸人，多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外國教育行政或學術上有相當成就之人。由上述諸文顯示在民初在教育史研究的選題上，相較於晚清，政治色彩逐漸淡化，內容逐漸轉向重視學術，此為民初教育史類譯文明顯的特徵。這些文章，多以小傳的方式書寫，藉由個人傳記的型態，介紹當代國內外教育家思想或其教育事業。

二、民初教育史教科書的編寫情形

此部分首先分析字字教育史教科書的內容範圍，瞭解民初教育史的教學內容，再以戴克敦的《教育史講義》為例，分析該書內容及特色。

(一) 民初所刊行教育史教科書的內容範圍

民初負責刊行教育史教科書的機構中，商務印書館是主要的出版機構之一，茲依目前所見史料，將民初所刊行的教育史教科書整理為表4-2：

表4-2 1912-1918年間刊行教育史教科書的內容範圍

¹⁵⁷ 參見錢智修，〈蒙台梭利女史小傳〉，《教育雜誌》，(第六卷，第三期，1914)，頁總6687。

¹⁵⁸ 參見莊俞、劉永齡，〈述印度教育家薩格碩士之言行〉，《教育雜誌》，(第七卷，第十二號，1915)，頁總9610。薩格之著述有《史學與人類希望論》(*The Science of History and the Hope of Mankind*)、《教育學引言》(*Introduction of the Science of Education*)等。同左引書，頁總9613。

¹⁵⁹ 參見太玄，〈美國大教育家依略脫傳〉，《教育雜誌》，(第六卷，第十號，1914)，頁總7654-7655。

¹⁶⁰ 郁根著述有《生活之根本及觀念》(*Life's Basis and Life's Ideal*)、《宗教真詮》(*The Truth of Religion*)、《人生問題》(*The Problem of Human Life*)等。參見錢智修，〈德國大哲學家郁根傳〉，《教育雜誌》，(第七卷，第二號，1915)，頁總8229。

¹⁶¹ 布格遜相關著作有《物質與記憶》(*Matière et Memoire*)、《創造進化論》(*L'Evolution Creatrice*)、《笑論》(*Le Rire*)、《變化之認識》(*La Perception du Changement*)等。參見錢智修，〈法國大哲學家布格遜傳〉，《教育雜誌》，(第八卷，第一期，1916)，頁總9793。

¹⁶² 同前引書，頁總9792。

原書目資料	內容範圍	出處
中島半次郎著，周煥之、韓定生譯，蔣維喬校，《中外教育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4)。	1.先秦部分周公與儒、道、法諸子均有專節，三國兩晉南北朝教育有專章，宋代理學家以胡瑗為祖，列周、邵、張、二程、朱、陸諸家，王安石興學亦有專節，清代已述及京師同文館、京師大學堂、《奏定學堂章程》、廢科舉、設學部，迄于1907年《女學堂章程》的頒布。 2.分總論、中國、外國三部分，講述中國周至清代的教育史，將外國教育史分為日本、西洋兩部分，均依上、中、近世分述之，介紹了日本、希臘、雅典等八國各時代的教育情況，對中外各大教育家，博采其生平言行進行論述。	杜成憲等，(1998，頁11)。 金林祥主編，(2000，頁52)。
楊游編，《教育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4年)。	分兩編，一為中國教育史(包括中國古代學術之源流、社會的趨勢、諸家學說)與日本教育史，二為西洋教育史，介紹歐洲古代、中世紀及近代教育和教育改良家。	金林祥主編，(2000，頁52)。
李步青著，《(新制)教育史》，(北京：中華，1915)。	分緒論、中國海禁前之教育、清季教育及民國學制等4章，為文言體。	金林祥主編，(2000，頁52)。
韓定生編，《中外教育史》，(上海：商務，1914)	缺。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中文教育書目編輯組，(1898，頁21)。
戴克敦，《教育史講義》，(上海：商務，1913年)。	緒論 第一章：教育史之範圍；第二章：教育史之性質；第三章：研究教育史之必要；第四章：教育史之順序 第一篇 中國教育史 第一章：古代教育史(上古、周代)；第二章：中古教育史(秦之教育、漢之教育、魏晉至隋教育、唐之教育、佛教與我國文化之關係)；第三章：近世教育史(宋之教育、元之教育、明之教育、清之教育) 第二篇 西洋教育史 第一章：古代教育史(希臘之教育、希臘之教育家、羅馬之教育)；第二章：中古教育史(黑暗時代之教育、基督教之教育、僧侶教育、武士教育、市民教育、煩瑣理學、大學之設立)；第三章：新舊過渡時代之教育(文學之再興、宗教之改革、教育之改良)；第四章：歐美近時之狀況(德國之教育、法國之教育、英國之教育、美國之教育) 第三篇 東洋教育史 第一節：維新以前之教育；第二節：維新之初之教育；第三節：學制時代之教育；第四節：教育令時代之教育；第五節：學校令時代之教育 第四篇：中華民國現時教育史 第一章：民軍起後教育之狀況；第二章：民軍起後之教育；第三章：教育行政；第四章：教育部公布之法令；第五章：非教育部所轄之教育	戴克敦著，1913。
余寄，《教育史要覽》，(上海：商務，1917)。	(受験準備用書)	金林祥主編(2000，頁49)。

張華年編纂， 《新體教育史 講義》，(上海： 商務，1918)。	分五編，講述教育史的定義、範圍，中日和西洋教育史以及 德、法、英、美等國教育現狀。(為師範講習所用書)	金林祥主編 (2000，頁 52)。
---	--	--------------------------

由於目前未有更具體史料，以供詳細說明民初教育史教科書各章節細目與內容，因此僅能由表 4-2 所列範圍做粗略推論。概括而言，民初所編譯教育史教科書的內容範圍，與晚清所譯介的外國教育史教科書相比並無大異。然以戴克敦《教育史講義》一書為例，則可發現晚清葉惟善《兩淮師範學堂教育史講義》中的印度、埃及、波斯、阿剌伯等地的敘述已不復見，唯佛教一節雖有，卻已縮減至由唐代傳入中國寫起。

(二) 民初教育史教科書的特色 — 以戴克敦《教育史講義》為例

基於台灣目前所見史料的限制，以下擬以戴克敦編輯的《教育史講義》一書為例，分析該書的內容與特色。

大體來說，戴克敦的《教育史講義》，相較於晚清增戶鶴吉《教育史》一書的觀點，研究教育史的順序已有差異。亦即戴克敦在介紹中國(附印度)、西洋、日本各國的狀況以外，提出了新的體例，他表示：

自來研究教育史之順序有三。一編年為例，就其年代之遠近，以明教育之變遷。二分國為，就各國之學制，以明教育之沿革，三分別學派，以辨其學說之異同。是三者，皆專門教育史所取，而要非論於普通教育史。¹⁶³

由上所述可知，第一，晚清研究教育史的順序採取「編年體」方式，在民初教育史教科書的編撰上已成為共識。第二，「國別史」體例，則成為研究教育史的另一個特色。第三，採學派別，則是治思想史體例。第四，「編年體」、「國別史」及「思想史」三種體例，都是研究教育史走向「專史」的途徑。在此，民初戴克敦的《教育史講義》，已發現教育史的研究開始產生由普通史走向專門史的學術傾向。

¹⁶³ 參見戴克敦編，《教育史講義》，(上海：商務，1915)，頁 5。

此外，書中內容述及中西教育史者，氏所抱持的問題意識與歷史解釋，亦有特色，茲舉四條史料為例：

漢代表彰儒術，非不詳備，然其所以不能媲美周代之故，一由於武帝尊經，專以儒家為標，而師儒之所守，弟子之所承，遂各拘牽舊說，不敢倡一新義，以增進國民之智識，而學術思想，乃愈趨而愈狹。一由漢之重儒，在以利祿為鼓舞之具，而士之入學者，先有一進堂階之想，故黌舍雖盛，而獨立特行之儒，未嘗多覩，至吾族之教育，恆有退而無進者，其弊實由於此。¹⁶⁴

由上述總結漢代教育的解釋可知，戴克敦認同漢代在學術思想上專守儒家舊說，在教育政策上則僅以利祿作為籠絡讀書人的手段，二者是造成中國民族教育守舊不進的主要弊病。另外，在論及游學生教育時，戴氏云：

二十世紀競爭劇烈之場，非仗學術之進行，無以張國威而奠邦本，故於酬勳計畫中，仍寓績學制用之意，前此，所未有也，此後人才，當必有日新月異之效果。¹⁶⁵

上文除可見提振游學教育之舉蘊含「績學制用」之意，並寄望藉此能對日後鞏固國邦能有重大影響外，戴氏在綜觀中西教育史後云：

國基方定，來日正長，倘各教育行政官均發其大宏誓願，各教育輔助機關悉本其普度深心，挽回積習，是則編者之所敬謹，秉筆以待，為我濡滯不進之教育史上，一雪前恥者已。¹⁶⁶

戴氏所編《教育史 述》一書所陳述的歷史解釋，以上所舉例者雖僅針對

¹⁶⁴ 同前引書，頁 23。

¹⁶⁵ 同前引書，頁 136。

¹⁶⁶ 同前引書，頁 139-140。

漢代教育、游學生教育與綜論中外教育史，但是諸如此類改過雪恥與積極振作之言詞則頗為多見。由上文所述可知，戴氏欲藉由歷史經驗，探究中國學術弊病的主要原因，對游學教育寄予厚望，並呼籲教育機關積極用心餘提振教育，如此更可以說明當時民族主義風潮對民初知識份子的影響，依然是促使學者編撰教育史的一大動因。從另一方面來說，民初由於編寫教育史教科書，亦形塑了中國古代、中古、近世教育史，與中華民國當代教育史一脈相承的民族教育史。國族的歷史由皇朝政體轉變至共和政體，戴克敦由古往今編輯一遭，直抒「國基方定，來日正長……挽回積習……秉筆以待」胸臆，假教育史教科書的編寫與講授，透露對國家的未來抱持希望，以此展望未來。

三、研究成果—以郭秉文《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為例

郭秉文（1879~1967），字鴻聲，江蘇江浦縣人。1896年畢業於上海清心書院。1908年赴美留學，1911年獲得烏斯特大學理學士學位，之後又攻讀教育學，於1912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並繼續研究教育史。1914年，他以*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這篇論文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成為在美國最早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之一。次年，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出版了他的博士論文，美國著名教育家孟祿為之作序。¹⁶⁷杜成憲等人認為，該書「是一部中國教育制度簡史，也是中國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質的教育制度史」。¹⁶⁸

郭秉文的《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在研究目的上，其〈緒言〉首先表明，「夫一國之有教育制度，即所以助其國陶淑人民之性情。今日趨於監凝與齊一，巍然並立乎天地間者也，迨乎今日吾國教育家既諳斯義矣，則殫精竭慮，思合近世之趨勢，應最新之需要。……」¹⁶⁹

而所謂「公共教育制度」，郭氏謂：「乃指國家所維持與管理之學校，所以為人民教育者。」¹⁷⁰並由於考試制度及私人創設學校對中國教育影響甚大，故亦旁及略述。¹⁷¹至於實際的研究範圍則相當廣泛，以下依時間斷限與內容範圍二部分

¹⁶⁷ 參見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頁54。

¹⁶⁸ 參見杜成憲、崔運武、王倫信，《中國教育史學九十年》，頁12。

¹⁶⁹ 參見郭秉文，〈緒言〉，《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頁1。

¹⁷⁰ 同前引書，頁2。

¹⁷¹ 同前引書，頁1-2。

說明。

第一，在時間斷限部分，郭氏將唐虞以前教育發端至秦代，列為「上古教育制度之起原」，漢至清朝自成一編（第二編），新式學校興起至民國時代教育發展則屬「新舊教育之過渡時代」，¹⁷²全書共八編。第二，在內容範圍部分，該全書結構安排上，郭氏以四編的篇幅，探討清末以後中國新教育制度改革狀況。中國近代以前討論的內容主題，以中國學官、學校、課程、考試、教育行政法等制度為主，旁及教育宗旨、教育法、男子與女子教育準則、學校性質等；近代以後，則詳細介紹鴉片戰後中國新學引進與官方教育改革經過。

最後，基於上述考察，分析現今國民教育之重要問題，並提出教育改革促進國家進步、教育不以政治生涯為終鵠、教育制度當行中央集權，並融合地方分權制以避免二種制度之極端及學校課程編製需深思融會中西精華等建議。¹⁷³

郭氏的《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書正如其緒言所述，是為考國家最近需要而作，其「實用」的色彩極為濃厚。另外，杜成憲等人所認為，郭氏將中國教育制度定義為「吾國公共教育制度」之舉，不免「以西鑄中、以古鑄今」；¹⁷⁴針對研究方法，蔡振生認為，郭氏之書兼采中國古籍與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學者的著作，「尤其是吸收了二十世紀頭十年美國學者對中國教育的研究成果與方法。」¹⁷⁵郭秉文治史見解與養成教育的影響可留待進一步探討，然由此可以瞭解，郭秉文的《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與戴克敦的《教育史講義》，分別從教學與研究不同層面觸及教育史的實用或實踐特性，而此特性是與國家教育需要密切相關。

綜上所述，民初教育史學門的發展，教育期刊多刊載個人傳記類文章，並在選題上漸趨重視學術性，政治色彩較為淡化；而所編寫教育史教科書的內容範圍與晚清差異不大，以戴克敦編輯《教育史講義》書中建議朝專門教育史方向研究，且可採編年體、國別史、思想史等體例；至於研究成果部分，郭秉文的《中國制度沿革史》一書，除彰顯教育史具實用性質外，亦反映菁英民族主義意識對民初

¹⁷² 參見郭秉文，〈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目錄〉，同前引書，頁 1-8。

¹⁷³ 參見郭秉文，《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頁 147-155。

¹⁷⁴ 參見杜成憲、崔運武、王倫信，《中國教育史學九十年》，頁 12。

¹⁷⁵ 參見蔡振生，〈中國教育史研究的歷史回顧與反思〉，《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三期，1988），頁 37-38。

部分知識份子仍有所影響。